

《1984》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董 英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长沙 412000)

摘 要:从社会性别角度来审视《1984》,其女性角色之形象特征从两个方面被构建:首先,在小说中被以老大哥为代表的现代极权主义构建;其次,男性叙事者本着男性中心思想预设了这些女性的形象特征。《1984》中的女性形象处于一种被双重塑造的处境。

关键词:《1984》;社会性别;女性形象;极权主义

反乌托邦小说《1984》是英国现代作家乔治·奥威尔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是他对于自己一生政治思考以及文学创作的最后总结,集中体现了他让政治写作成为艺术的文学理想。^[1]在《1984》中奥威尔意图批判极权主义,他要表现的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专制主义,现代科技和高效的组织体系使得对社会和个人的专制达到以前所有专制和独裁不可企及的地步。小说一方面是层层深入揭示极权政治,另一方面又演绎了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对极权主义的反抗。如果说,男主人公温斯顿主要是以一种思想犯罪的方式进行心灵的反叛;那么女主人公裘莉亚则是行动的反抗,她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用性爱的欢愉和激情来反抗。从社会性别理论角度来解读其中的女性,^[2]可以发现: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身份其实是在两个层面被建构,一是被小说中的独裁者老大哥所代表的极权主义所建构,一是被叙述者以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立场建构。《1984》中的极权国家,是父权社会的极端体现,政治极权渗透到公共生活、私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其中突出的就是极权对于女性身体、形象、情感、社会地位的全面规训和控制。与此同时,叙述者以及男主人公温斯顿,也以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女性,塑造女性的角色和功能。因此女性在《1984》中处于被双重塑造的地位。

一 极权主义的性别政治

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掌握了政治、经济以及各种话语权力。《1984》中的老大哥就是父权的形象

载体,大洋国是按照父权社会控制方式和网络来运行的象征,极权统治者的主要原则和信条就是控制、支配和执掌绝对的权力。奥威尔借大洋国核心党成员、审讯官奥勃良之口说出了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种赤裸裸的权力意志:专制者要当权完全是为了它自己,他们只对纯粹的权力有兴趣。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真正的权力,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战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3]²⁴⁰极权主义创建的世界与一直以来人类所设想的那种人间幸福的乌托邦正好相反,是一个恐惧、叛卖、折磨的世界,一个臻于完善却越来越无情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所谓进步就是朝向越来越多痛苦的进步。除了爱老大哥以外,没有其他的爱。极权主义的学说就是这样一种关于全能权力的学说。

在小说中,身处极权主义国度的女性形象和身份有以下特点:

首先,被无所不在的极权规训、监控和惩罚。极权社会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女性也自动接受并放弃了思考的权利。《1984》中的女性形象: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女教练、派逊斯太太、派逊斯的小女儿、温斯顿的母亲,还有凯瑟琳等,通过早期的周密的灌输,通过游戏和冷水浴,通过在学校里、少年侦察队里和青年团里接受的灌输,通过讲课、游行、歌曲、口号、军乐等等,她们的天性已被扼杀得一干二净。“她们都是攻不破的,完全按照党的要求那样。”^[3]⁶⁰在“两分钟仇恨”中,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甚至把“老大哥”看做她的救星。

收稿日期:2008-09-01

作者简介:董英,女,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师院校区外语系副教授,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其二,女性自身成为权力控制网络中的一员:控制、监视他人。“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义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3]10}温斯顿发现他的两个手指沾了墨水迹时候,他马上意识到真理部同事中的女人已经开始观察他,并起了疑心。每天早上在电幕上监视人们的教练也是个女教练。在她严厉的监视下,温斯顿警告自己千万不能露出不快的神色,不能露出不满的神色。甚至那些小女孩,例如温斯顿的同事派逊斯的小女儿,一个约七岁的小女孩,偷偷跟踪一个可疑的人整整一个下午,然后把他交给了巡逻队。

其三,女性成为去除女性自我的阴暗的中性人。女性美成为罪恶,性仅仅是繁衍后代的工具,而且是耻辱、污秽的行为。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清心寡欲的思想像对党忠诚一样牢牢地在她们心中扎了根”。温斯顿和凯瑟琳分手是因为“她的肉体已被党的催眠力量所永远冰冻了。”^{[3]59}所有这一切都是源于极权统治者的控制。“党竭力要扼杀性本能,如果不能扼杀的话,就要使它不正常,肮脏化。”^{[3]58}极权主义消除女性的性别特征,将女性中性化,禁欲使性爱成为肮脏的行为,最终要使得女人不成其为女人,而是被重新塑造的社会工具。从性别政治来看,极权主义不是制造男女的不平等,而是要取消性别,取消女性。

二 女性自我的身体反抗

奥威尔认为,极权主义对女性的侵害,使女人丧失了属于女人的天性和气息。裘莉亚作为一个反抗极权的女性形象,就是要在女人不能成为女人的时代,回复女性自我。如小说中写到的裘莉亚的宣言:

我要穿丝袜,高跟鞋!在这间屋子里我要做一个女人,不做党员同志。^{[3]127}

裘莉亚的反抗方式是让自己成为女人,使性爱成为欢愉,用身体来作为叛逆的武器,用享受肉体的激情来反抗。裘莉亚在温斯顿之前,几十次、几百次与其他外围党(大洋国统治者的外围人群)党员发生过性关系。她嘲讽核心党(大洋国的统治者集体)的党员为畜牲,并点出他们如果有机会,有不少人会愿意干,他们并不像他们装作的那样道貌岸然。温斯顿从围绕裘莉亚所发生的腐化堕落的事中感到充满希望。因为他知道,在表面的底下极权统治者是腐朽的,它提倡的禁欲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掩饰罪恶的伪装。而性爱,成为了能够腐化、削弱、破坏极权的事情。裘莉亚宣称“我热爱这件事(做爱)”,

这使得温斯顿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一个人的爱,而是一种生命原始的本能,一种简单的不加区别的欲望,这能够把极权统治搞垮。因此,温斯顿的梦中出现了这样一副情景:

那个黑发姑娘从田野那头向他走来,她好象一下子就脱掉了衣服,不屑地把它扔在一边……这个时候他压倒的感情是钦佩她扔掉衣服的姿态。她用这种优雅的、毫不在乎的姿态,似乎把整个文化,整个思想制度都消灭掉了,好象老大哥、党、思想警察可以这么胳膊一挥就一扫而空似的。^{[3]28-29}

极权统治者之所以要消除女性的性特征,要使得性成为肮脏的行为,其目的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无法控制的誓盟关系。性交被看成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象灌肠一样。裘莉亚敏锐地了解极权统治者在性方面搞禁欲主义的内在原因。这只是因为性本能创造了它自己的天地,非极权统治者所能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尤其重要的是,对被统治者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歇斯底里,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可以把它转化为对领袖的狂热崇拜。正如裘莉亚所言:

你做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3]118}

在禁欲和极权政治上的正统性之间,的确有一种直接的紧密关系。在《1984》所描述的极权时代中,男女反抗者的性爱本身就是造反,性欲被视为思想罪,人们已没有纯真的爱或纯真的欲念,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每一次拥抱就是针对极权统治的一场战斗,是对极权主义的打击。性爱成为一件政治行为。

三 女性反抗的限度与矛盾性

奥威尔一生对当时兴起的女权主义时有针砭和嘲讽,一方面,他一直对知识分子发明的各种流行的抽象理论抱有深刻的怀疑,因此女权主义也是其中之一。^[4]另一方面,奥威尔的女性观保守而传统,他对那种咄咄逼人、高谈阔论的现代女性敬而远之,而倾向于那些具有女人味的女性气质。^[5]而极权主义对女性的侵害,他认为就是使得女人丧失了属于女人的天性和气息。

在《1984》中的大洋国,男性主人公温斯顿的反抗,使得他恢复了自己的心灵自由和独自思考,用自

己的语言来表达,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真实世界的能力,在极权主义重重谎言的迷障中触摸到了真实。温斯顿还恢复了属于自己的记忆,动摇了伪造的历史。在反抗极权主义的过程中,男性主人公温斯顿重新找到自我的主体意识。

相形之下,女性主人公裘莉亚的反抗则是生理本能驱动的。当温斯顿对裘莉亚说:“你只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3]145}时,“明晰指出一种男性中心意识限定下的女性角色意识。裘莉亚最有力的话语就是身体话语,她做得最有力的叛逆行为也就是感官上的,超出感官以上的世界,她就欠缺认识,更没有担当。裘莉亚宣称:“我对下一代没有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自己有兴趣。”^{[3]138}她不对未来负责,也不愿对他人负责,只是追求自己的身体快感。她承认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现有的一切,不知有别的世界,把极权统治视为万世不易的东西,就像头上的天空一样,对它的权威绝不反抗,只是千方百计加以回避,就像兔子躲开猎狗一样。她非常乐于接受大洋国历史一夜之间的篡改,也不愿对此多加思考。她对极权主义的理论和细枝末节毫无兴趣。当温斯顿冒着危险大声读着那本激动人心的果尔得施坦因的禁书时,她却在一旁睡着了。因此,同样是对极权主义的反抗,作为女性的裘莉亚只是一种没有主体意识的身体反抗,她也没有在反抗中成长为自为的独立个体。小说中,裘莉亚冒着生命危险向温斯顿传递写有“我爱你”的纸条,并主动向温斯顿奉献自己的身体,其目的方面是出于自己身体欢愉的追求,一方面也是将自己再客体化,即在男性主体面前恢复女性客体身份。裘莉亚的理想是在男人面前,涂上胭脂,扑上粉,用上香水,穿上一件真正的女人衣裙,成为取悦于男人的女人。她厌恶其他女人,对自己能获得各种男人的垂青自鸣得意,而且,在小说中,裘莉亚对温斯顿的献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温斯顿男性主体意识的恢复来服务的。这种坚强的具有支配性的男性气质曾被极权统治者剥夺,现在终于在女人身上追回。对于温斯顿而言,他是在裘莉亚身上,重新找回被极权“去势”的男性主体意识,特别是对女性的支配、占有的快感:

他把她拉到地上,她一点也不抗拒,听任他的摆布,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3]106}

她成了一种生理上的必需,成了一种他不仅需要而且感到有权享有的东西。^{[3]124}

这样看来,温斯顿和裘莉亚的性行为是一种叛逆,但裘莉亚反叛的只是女性对专制者的愚忠,而温

斯顿却另外还从中找回了男性被剥夺的权力。^[5]小说中还多次流露出男性在极权主义的压抑状态下,对于女性的占有、征服、支配的权力丧失,以至于转化为一种想象中的对女性施虐的欲望:

他想象自己用橡皮棍把她揍死,又把她赤身裸体地绑在一根木桩上,象圣塞巴斯蒂安一样乱箭丧身。在最后高潮中,他污辱了她,割断了她的喉管。^{[3]14}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奥威尔叙述的极权时代中性别政治的复杂性。作为社会性别的女性,总是被建构的客体。奥威尔揭示了极权主义性别政治的非人性特质。极权统治者要消除女性性别特征,将其转化为中性的社会工具。它要摧毁性爱,或者使其肮脏化,因为性爱是不可控制的本能力量,必须将这种力量转移到极权统治的维护上。奥威尔认为,反抗极权主义,就必须恢复女性的女性特征、女性气质,恢复性爱的原始的本能的欢愉。但在这个过程中,小说里的女性反抗者形象是感官化的、欲望化的,既缺乏男性主人公那样一种理性的自省和思考能力,也体现出女性在男性主体面前的再客体化。从这个角度来看,《1984》中的性别政治又意味着一种争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和反抗者在争夺建构女性、塑造女性的权力。温斯顿先是赢了一个回合,裘莉亚在为恢复温斯顿的男性气质和男性主体意识在奉献自己,女人变回了女人。但在小说的结局,温斯顿在残酷的拷打迫害下不仅出卖了裘莉亚,他还希望针对自己的恐怖刑罚转嫁到裘莉亚身上,他的男性主体意识再次被剥夺,当然,支配女性的权力也就回到了极权统治者手中。

参考文献:

- [1] 乔治·奥威尔. 我为什么要写作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102
- [2] 李银河. 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151 - 175.
- [3] 乔治·奥威尔. 1984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4] George Orwell 确良 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4: 187.
- [5] 王小梅. 《一九八四》中的男性中心论 [J]. 当代外国文学, 2005 (3): 88 - 90

(责任编辑: 卫 华)